



发心求正觉 忘己济群生

附：并非名僧的高僧、我的出家生活

济群法师

发心求正觉，忘己济群生 3

并非名僧的高僧 29

【何谓“高僧”】 31

【清修还是旅游的发展之争】 37

【佛法是心灵的智慧】 43

我的出家生活 49

【一、农禅并重的支提寺】 51

【二、禅宗祖庭雪峰寺】 56

【三、八闽首刹涌泉寺】 63

【四、清净庄严的广化寺】 71

【五、轰轰烈烈的南普陀】 79

自号山人的济群法师，居于五老峰阿兰若处。阿兰若为梵语音译，意为寂静处。此处曾是近代高僧弘一大师住锡南普陀期间的掩关静修之地，如今，刻有弘公手书的甘露井依然泉涌汨汨，清冽如昔。

泉边品茗，岩下步月，如此闲适的山居时光，并不在人迹罕至的深山，事实上，它距闹市不过几步之遥。但能得门而入，无须跋涉，便是别样洞天。人生，何尝不是如此？

穿过甘露井所在的几重岩洞，是掩映在竹影中的石砌禅房。屋中素朴的白墙上，挂着“发心求正觉，忘己济群生”的木刻楹联。这副集自《华严经》



的对联，不仅彰显了大乘自利利他的核心精神，也是兰若主人始终不变的愿力所在。

正是在这份愿力的推动下，十多年来，法师往返于兰若与尘世之间，法音广宣，度众无量，足迹遍布海内外各地。由他参与创办并担任导师的戒幢佛学研究所，也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适合当代的佛教教育体系。弘法教学之余，法师还以文字般若与大众广结法缘，目前，已出版人生佛教、修学引导、戒幢论丛、以戒为师四大系列丛书三十余册。其中，既有接引初学的启蒙读物，也有深入经藏的研究论丛；既有面向信众的开示，也有僧团建设的指导。他对经教义理所作的现代诠释，使无缘亲聆法音的读者得以品尝法味，啜饮甘露。

日益繁忙的法务，使法师独享山色的闲暇相应



减少。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月，法师先是作为“西园戒幢律寺第三届菩提静修营”的导师，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佛子作了为期三天的《心经》讲座，并为营员传授三皈五戒、菩提心戒，主持西园夜话、传灯法会。紧接着，为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学员们讲授一周的《沙弥律仪》。然后又前往厦门，参加“第三届厦门佛事用品展”的开幕式。展会上，组委会特别提供了近百平米的展位，用于济群法师佛学系列丛书的展示与结缘。月末，由法师发起并主持的“佛法与心理治疗”研讨会又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拉开序幕，这是国内教界和心理学界的首次正式对话，来自各地的法师及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。

舟车劳顿中的法师，依然有着山居时的淡定和



从容。或许，这正是一个修行人“以出世心行入世事”的境界吧。因为慈悲，所以入世度众；因为智慧，所以不著世间。

带着对方外之人的好奇和向往，记者采访了济群法师。

2008.11

问：法师是如何选择出家生活的呢？

答：其实我出家的经历很简单，当时年纪还小，对佛法和社会都没什么认识。之所以会选择出家，主要还是因为受家庭影响。如果说当时对佛教有什么印象的话，那只是好感而已，而且这种好感还很朦胧。

因为家中常常接待很多南来北往的出家人，也就结识了不少僧人。或许是缘分吧，他们都很喜欢我，经常带我到各个寺院去。我从小就很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，所以，出家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。



问：按佛教的说法，法师可谓“童真入道”，这对于您日后的成长产生了什么影响？

答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童真入道的确是很关键的因素。也就是说，在我尚未被世俗染污之前，就已经开始了出家生活，而佛法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童真入道又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受佛法教育，从而对我的成长和人格形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问：古德时常赞叹童真入道，这似乎与现代社会提倡的早期教育不谋而合。那么，法师是否认为童真入道是成为一个僧人的最佳起点？

答：教界童真入道的人也很多，但其中有不少人的成长道路却和我截然相反。他们像我一样



早早就出家了，在那样的年龄，也谈不上什么明确的人生目标，多半只是受到家庭影响。如果剃度后不曾从学佛中获得法益，对外界诱惑就不具备抵抗能力。随着年龄渐长，开始和社会有所接触，往往会因各种原因回到尘世。这几年，佛学院毕业生中还俗者不少，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小出家的。

由此，也促使我对童真入道的问题产生了反思。我认为童真入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在年龄上，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修学佛法；二是在僧格养成，因为一张白纸更容易接受佛法熏陶。但这两点优势，又恰恰是它的不足之处。少年出家，文化基础多半薄弱，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。再就是对社会缺乏了解，往往缺乏免疫力。

和童真入道不同的是半路出家，它也同样有利有弊。其优势在于：世俗生活都已经历，既然发心出家，也能自觉将这些放下，不易产生动摇。另外，多数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经验，为今后深入经藏、利益众生奠定了良好基础。而不足之处在于：经历了长期的世俗生活，习气往往比较重，而人到中年后，性格多半已经定型，再要改变以往的不良习气就很困难。这种人如果没有强烈的出离心，又缺乏良好的修学氛围，在寺院不用生活多长时间，就会原形毕露了。所以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很难说孰优孰劣。

问：曾在法师的著作中看到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。”当时非常感动，我想



这就是佛教中常说的“善根深厚”吧！

答：无论学佛还是出家，善根当然非常重要。就像一棵树，如果根扎得深、扎得稳，就有能力抵御外来冲击。尤其在现代，仅靠寺院的一道围墙很难与社会完全隔绝。所以一定要对出家身份有足够的认同，而其中关键就在于对三宝的信心。

就我自己来说，出家过程虽然比较简单，也比较感性，但通过对佛法的深入学习，使我更坚定了这一选择。因为弘法的原因，对社会有了更多接触之后，越发认识到，追求真理、智慧和解脱的人生是最有意义的。此外，出家生活清净自在、无牵无挂，也非常适合我的性情。

问：您出家时，应该是宗教政策尚未落实之



际。在那个年代,您是如何开始出家后的修学生活?

答: 的确, 当时宗教政策还未落实, 佛教仍被社会视为封建迷信。在这样的大气候下, 整个教界的修学环境并不理想。

我最初是在福建宁德支提寺, 当时出家人白天种田, 早晚上殿, 生活条件极其简朴。在现在的人看来, 应该说是相当艰苦。但他们都真心向道, 信心道念非常坚固, 没有谁是为衣食而出家。老和尚们生死之心很切, 就是在那时, 我才知道出家是为了“了生死”。虽然还不懂得“了生死”究竟是怎么回事, 但现在回忆起来, 应该是我最初接受的佛教教育。其后又到福建闽侯雪峰寺, 基本还是继续这种农禅并重的生活。这一方面使我养成了山野之人的气质, 并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



喜爱；一方面也为僧格养成奠定了良好基础。这段时间的生活，对我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。

尤其不能忘记的是，在我成长过程中亲近过的三位老人家，一是福州鼓山涌泉寺的普雨老和尚，二是莆田广化寺的圆拙老法师，三是厦门南普陀寺的妙湛老和尚。他们成就我出家，成就我上学，成就我静修，给我修学上的指导，给我创造弘法的条件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各种做人做事的美德，终身受用不尽。这也使我想到了，一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，依止善知识的重要性。

问：在今天，无论社会还是教界都有了巨大改变，修学环境更为宽松。法师是否认为，您当年所经历的生活，对其他初出家者也非常重要？换句话



说，对于刚剃度的人，什么环境才是最理想的？

答：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。对于刚出家的人来说，最关键的，是接受成为一个僧人的基本教育，也就是造就僧格的教育。关于出家后的教育，在佛教戒律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。如沙弥必须依止自己的亲教师，不可独立生活。即使受过比丘戒之后，还须“五年学戒，不离依止”。此外，刚出家也是僧格养成的开始，必须有善知识指导，有如法的修学环境。刚出家的人，大多有良好的初心，但不易持久。有句话叫做“出家一年，佛在眼前；出家三年，佛在西天”，这份初心为什么会变质呢？关键还是因为出家后未能继续长养这一发心，结果半途夭折。



问：法师后来又就读于中国佛学院，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，又在教学之余从事弘法活动，面向社会及高校开办佛学讲座。当时弘法在国内尚未普及，整个社会对佛教还是充满了误解，此举可谓开风气之先。那么，法师又是如何走上弘法道路的呢？

答：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，还不知道弘法是怎么回事。因为出家前文化和佛学基础都比较薄弱，所以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。毕业后来到莆田广化寺，在后山一个僻静的地方继续学习。读书之余，也在佛学院讲课。广化寺的几年生活，使我在佛学院所受的综合教育的基础上，对戒律、俱舍和唯识有了进一步的研究。1988年来到南普陀寺，在阿兰若处静修。这种清净自然的环境，



对我的学习、修行和弘法事业都有很大帮助。

厦门是个沿海开放城市，与东南亚及港台有着频繁的交流往来。由此，也有因缘接触到很多来自海外的法师，并从他们的介绍中，对海外弘法事业的发展有所了解，这才使我萌生了弘法的愿心。首先是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，和湛如法师一起为信众开设“正信佛教”和“人生佛教”系列讲座。当时我们还在厦大历史系进修研究生课程，这一因缘又使我们得以在厦大举办“佛教文化研讨班”，开始面向高校的弘法。其后，又应邀到各地举办佛学讲座。我就这样走上了弘法道路。

问：能否请法师具体介绍一下您目前的弘法事业？



答：从 1992 年开始，我一直在国内外举办各类佛学讲座。在弘法过程中，我深切体会到社会对佛法的需求，而教界能够从事弘法的人实在寥寥无几。所以，培养人才是教界目前的当务之急，因为“道在人弘”。我出家近三十年来，从求学到教学，大部分时间都在佛学院。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，也基于对佛教未来前景的关心，希望能在现有基础上，探索出一套具有佛教特色的教学模式。目前，我在闽南佛学院担任研究生导师，同时也在苏州西园寺主持“戒幢佛学研究所”的工作，和教内外有志于佛教教育的法师、学者一起，共同实践我们对佛教教育的一些想法。

问：多数人都认为，佛学院和研究所应该以培



养学术研究人才为宗旨。但法师在《我理想中的僧教育》一文中，却特别强调多种人才的培养。希望学员们在强化佛法修学的同时，与社会需求相结合，在自利利他的实践中成长。这些观点的形成，是否与您长期从事弘法事业有关？

答：对佛教教育来说，研究人才的培养当然是不容忽视的。还是以闽南佛学院和戒幢佛学研究所为例，两地都招有研究生，旨在为致力于佛学研究的僧众创造条件。同时，还发行了各自的学术期刊，即《闽南佛学》和《戒幢佛学》，既是为了展示教学和研究成果，也是为了推动国内佛学研究的风气。

但是，研究佛学并不是学佛的唯一目的。学佛的关键是在于自利利他、自觉觉他，是要能学



以致用,能以佛法智慧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。因此,戒幢佛学研究所还推出了面向社会的弘法刊物《人世间》。每期关注一个主题,如环保、财富、信仰、道德、护生等,希望从佛法角度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反思,从而纠正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存在的误区。

问:近年来,法师著述颇丰,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?

答:举办讲座的影响范围比较有限,整理成文,就能利益更多的人。自1999年出版“人生佛教系列丛书(包括《心经的人生智慧》、《幸福人生的原理》、《学佛者的信念》)”以来,近十年中,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。



目前已出版的书籍有四大系列，其中，以“人生佛教系列”的适应面最为广泛，即使对那些没有信仰的人，也可从理性层面来接受，共有十多小册。而“佛法修学系列”主要是针对信众的引导，并以皈依、发心、道次第等基础建设为重，如《皈依修学手册》、《认识菩提心》、《佛法修学次第》、《问道》等。“戒幢论丛系列”侧重于学术性，主要是对佛教经典的解读，如《真理与谬论》、《认识与存在》、《菩提心与道次第》。“以戒为师系列”则是2008年最新推出的，定位为“普法丛书”，希望通过戒律的简明解读，使僧团大众对法和律具备基本认知。现已出版第一辑，包括《认识戒律》、《戒律与佛教命脉》、《僧伽礼仪及塔像建造》、《出家剃度及沙弥生活》、《比丘资格的取得》五本。



问：音像制品是海外较为普及的一种弘法形式，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？

答：通过音像制品来弘扬佛法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比书籍的普及面更广。比如对那些认字不多、年老眼花的信众，或是对那些没有阅读习惯的信众，音像确实有着书籍所不具备的优势，而且更直观，更亲切。近年来，我们也在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，目前已出版各类音像制品数十种，约 200 小时的内容，有 DVD、VCD 和 MP3 等格式，并会将这项工作作为未来几年的重点。

问：从发展趋势来看，网络弘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。法师的个人网站也已运行多年，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，能否具体介绍一下？



答：通过网络弘法，的确比传统弘法方式有更为广泛的覆盖面，它是全球性的，不受地域等种种因素的限制。自1998年起，我们已涉足网络弘法，至2000年初具规模，推出两个网站。一是“戒幢佛学教育网”，包括佛学指导、人生佛教、佛教文化等十多个栏目，还有大量图像和音像资料，内容相当丰富。一是我的个人主页，包括我全部的文集和音像资料，对我参与弘法以来所做的各项工作作了全面概括。

目前，佛教界普遍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，而面向社会弘法就更显得薄弱。有鉴于此，“戒幢佛学教育网”还开办了“网络佛学院”，利用网络特有的优势，通过视频为散居各地的学佛青年上课并进行指导，这在过去简直是难以想象的。



问：法师常常说自己是随缘弘法，您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么多事业，是否总是有许多顺缘在推动？

答：我认为我个人所有的，只是对佛教事业的一份愿力和一些想法，正由于众多因缘的推动，才使我这些年来为社会和教界做了些事情。首先是宽松的政治环境，使我可以将想法都表达出来并付诸实践；其次是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为我提供了相当自由的活动空间，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内修外弘；第三是西园寺普仁大和尚的全力支持，使我能以戒幢佛学研究所为平台，实施教学理念；再就是各地护法居士的积极协助，这都为我的教学和弘法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如果没有这些因缘，很多想法也许至今还是想法而已。就我自己来说，虽然不是个积极主动的人，但对弘法事业始终保



有一份愿心。

问：从目前情况来看，教界这些年的发展相当迅速，寺院纷纷大兴土木，前去朝拜的信徒和观光客也明显增多，可谓“香火鼎盛”，但问题和负面新闻也在逐渐浮出水面。作为出家多年的法师，您对当今教界的现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？

答：从表面来看，佛教界的发展似乎是形势一片大好。但仔细观察，却发现其中还有太多问题，可以说是一言难尽。这里，就我想到的谈几点意见。

一、作为一个出家人，首先要明白，出家人的本份就是内修外弘。自身的佛学素养和道德水准提高了，才能给大众以正确引导，否则就会将



他们引向迷信、盲信的误区。而作为寺院来说，除了给僧人提供修学办道的环境，也是民众净化身心、舒缓压力的净土。定位准确了，才知道寺院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来面向社会。

二、应当加强佛教的制度建设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重建一套适合当代的佛教制度。比如出家的考核制度、沙弥的教育制度、新受戒比丘的修学制度等。此外，还应建立僧阶有序的制度，这种“级别”是根据僧人的戒腊、道德、学问及对寺院做出的贡献而制定，以此确立他在僧团中的地位 and 待遇。南传和藏传佛教也都有相应的制度，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

三、宗教政策落实以来，整个教界都意识到办学的重要性，先后办有几十所佛学院。虽然也



为佛教界培养出一些人才，但大家也共同意识到，这并不是培养佛教人才的最佳方式。在继承佛教传统教育制度的基础上，探索出一套适合现代的佛教教育制度，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。

四、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，许多寺院也在走向商业化。而商业化，实际就意味着佛教的世俗化。我对教界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非常担心，希望大家都能对此有所警觉。

五、佛教的商业化和世俗化，使很多僧众的信仰和道念淡化，长此以往，他们又何以荷担如来家业？所以，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，也是教界目前所要重视的问题。

六、对僧团的财富予以合理使用。因为旅游业和经忏的盛行，使得一些寺院非常富有，如何



使用这部分收入？在我看到的情况中，大部分是在修庙、造大佛，甚至浪费在各种无谓的应酬中，或存放在银行里舍不得使用，等着贬值。怎样将这笔财富用于佛教的弘法事业、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，是教界领导者们应予特别关注的问题。

七、教界应该认识到弘法的重要性，这一方面是因为出家人具有弘法的责任，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是佛教生存的土壤。所以，唯有在全社会弘扬佛法，佛教才有永久的生命力。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，佛法在今天的弘扬已不能停留在传统方式上，而是要契理契机。也就是在继承佛教传统的前提下，在不违背佛法基本义理的基础上，用现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去弘扬佛法。同时，从佛法的角度关注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，为大众提



供智慧的解决之道。

八、各地寺院虽然重建了不少，但多数都缺乏规划和设计，有的甚至比较俗气。寺院是民众的精神家园，建筑本身也应该能够体现佛法的内涵，也就是表法。所以在风格上要朴素、庄严、和谐。另外，在使用上要注意实用性，集修道、弘法、教学等多功能于一体。

《人物周刊》2009年第1期

并非名僧的高僧



见到济群法师，他正在西园戒幢律寺一间独居的禅房内盘腿打坐，墙壁上的一副对联巧妙地嵌入了法师的名号，“发心求正觉，忘己济群生”。法师身前的小几放着茶道的全部用具。合十见礼，彼此坐下，法师一袭灰衣，面带祥和微笑，斟泡手法娴熟。

法师现在的生活分处苏州和厦门两地。在苏州西园寺时，以教学、弘法为主，并处理佛学研究所的一些事务，接待高校、信众、专家的来访也要占据一些时间。剩下的时间，就用于禅修。在厦门南普陀寺，他有一间单独的禅房在半山上，在那里可以静心修学，并修订一些佛学文稿。另外，会有一些外出演讲的任务。

【何谓“高僧”】

济群 17 岁剃度出家，这在佛教中称为童真入道，而他与佛教结缘，却在更早之前。他说：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。

出生闽东的济群，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。在双亲带领下，全家信佛，吃长素。济群幼年的印象中，家里常有许多僧人来住宿、吃饭，而母亲总是热情招待，家里每天早晚都念经拜佛。一年秋天，母亲发心到福建东部支提寺帮忙修补藏经，当时 14 岁的济群也跟着同去。



《人物周刊》：童真未开时便身入佛门，等成年后了解自己将终生寂寥山门，会不会动摇幼年的直觉选择，曾有过困惑迷惘的时期吗？

济群法师：童真入道有利有弊，弊端就如你所说，有些人出家时年纪太小，对社会缺乏了解，往往缺乏免疫能力，且多半文化基础比较薄弱，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。但这也有优势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：一是年龄小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修学佛法；二是有利僧格的养成，因为在成长过程中，更容易接受佛法观念的影响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机缘一直比较顺，遇到了很好的老师、很好的环境，而且，我天性就非常喜欢、非常适合寺院的生活。

在我看来，寺院生活是清净自在的，而非大家以为的寂寥。当然，如果还有世俗需求，便很



难享受这份清福。就像很多来到寺院的人，虽然也喜欢这种清凉之境，但呆上几天后，却宁愿回到红尘中打拼。因为他们还需要到社会上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，来获取自己向往的一切。我的出家虽然比较感性，但随着修学的深入，却更坚定了这一选择。尤其是因为弘法而对社会有更多了解之后，越发认识到世俗生活的荒谬。相比之下，我觉得追求真理、智慧、解脱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。

《人物周刊》：您认为判断一个僧人是否是“高僧”的标准是什么？中国现代、当代中有哪些您仰慕的高僧？

济群法师：现代人往往将“高僧”和“名僧”



混为一谈，这个问题古已有之。早在南北朝时期，慧皎所著《高僧传》中，即对“高而不名”和“名而不高”作了区分。所以，我们不能仅凭名声来作出判断，就像社会上的很多名人，其道德素养未必能作为大众楷模。当然，也有很多既高又名、实至名归的大德。

我所理解的高僧，是依戒定慧三无漏学修行有成者。首先是持戒，具足清净无染的言行；其次是得定，拥有祥和寂静的心态；第三是具慧，拥有透视人生、超越生死的智慧。除了这些内在素养，还要有济世的悲心，平等关爱社会大众。所以说，是否高僧，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生命品质，而非外在的身份、地位、名声。

在近现代，我所仰慕的高僧有许多，如太虚



大师的博大胸怀、弘一律师的严谨作风、虚云老和尚的苦修精神，都是我深深景仰的。

《人物周刊》：具体地说，您认为一个出家人，特别是寺庙的方丈、高僧，他的主业应该是什么？他在社会生活当中应该扮演（担当）怎样的角色？

济群法师：作为一个出家人，主业就是内修和外弘。内修，即通过修行完成生命自身的觉醒和解脱；外弘，即帮助大众达到同样的目标。换言之，就是自觉觉他。如何才能抵达这一高尚的人生目标？首先要听闻佛法，获得正确观念，其次是以佛法正见重新认识人生，然后通过戒定慧的修行，彻底消除烦恼，成就解脱。作为出家人，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，还要看到芸芸众生也深陷于迷惑



和烦恼中。所以，还要在自觉的基础上，发起帮助一切众生的愿望，并将之作为尽未来际的使命。

作为寺院的方丈、高僧，首先是一个出家人，自然也离不开内修和外弘两大任务。当然，应该比普通僧众做得更出色，因为他们还肩负着领众修行的责任。至于在社会上，则应担当精神导师的角色，起到化导社会、净化人心的作用。

【清修还是旅游的发展之争】

对少年济群来说，到了鼓山涌泉寺，他出家的心愿才真正机缘成熟。他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。当时的职责是在客堂当照客。这个差事，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，负责扫地、打开水、倒茶、洗茶杯，还管客房的钥匙，给客人开门。

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，千百年来高僧辈出。文革期间，寺院被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，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，有的被迫还俗，有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，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



工，不准他们穿僧装，尼众必须重新蓄发。济群刚出家时，在涌泉寺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。济群的剃度师父普雨老和尚，文革中被打为黑教头，守在寺院中，做邮差、挑粪、种地，每月政府发给他20元生活费，但老和尚一直坚守在鼓山，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。1979年，在老和尚的努力下，涌泉寺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，归还僧众管理，济群就是那时来鼓山剃度的。

济群出家几年之后，他的父母亲也相继遁入空门。1980年，济群成为中国佛学院的第一批学生。

《人物周刊》：我注意到，苏州西园寺作为您的弘法基地，也是众多僧侣的清修之地，但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风景点，这中间如何平衡？



济群法师：现在各地政府都大力发展旅游，大环境如此。但西园戒幢律寺并没有特别在旅游方面下功夫，没有和旅游部门“主动挂钩”（笑），所以游客不是很多，比很多名刹古寺差得远。这里的普仁大和尚发愿弘扬佛法，专门成立了佛学研究所，一方面是发展教育，培养人才；一方面是弘扬佛法，化世导俗。西园寺的僧人不参与旅游服务，所有给游客提供方便的服务都由在家人承担。

《人物周刊》：对河南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为发展旅游推动地方经济有功，政府奖励名牌汽车这件事所引起的争议，您如何看？

济群法师：我对少林寺的情况并不了解，所



以无法具体评价这件事。目前，确实存在鼓励寺院发展旅游经济的大环境。过去我们很重视寺院的清净，但是清净和发展之间，有时也会有深层次的矛盾。以西园寺为例，这里游客不算多，每年收入如果维持僧人的生存和清修是没问题的，但如果要建设发展，就需要资金来源。西园寺最近新盖了“三宝楼”，未来将成为大规模的教学和弘法场所，这个楼的基建成本就是几千万。钱从哪里来？自然就存在一定困难。又想保持清净，又要适当发展，这中间确实有很多无奈。

但无论如何，如果放弃佛教之本，一味追逐利益，那肯定是“不如法”（违背佛教教义）的。

寺院，佛教也称为“道场”，是提供出家人修行办道的场所。对社会的外化功能主要有二：一



是净化世间，普度众生。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和健康的的生活方式，帮助众生净化心灵，解决人生烦恼和困惑。二是承担相应的慈善事业。因为寺院的信誉度较高，可以牵头组织善行义举，这在传统寺院中表现得特别明显。你们一定在电影电视及文学作品中看过，古代的饥荒之年，寺院会出面施粥，并为一些贫苦的读书人提供帮助等。目前，台湾教界在佛教慈善事业方面就做得比较好。

《人物周刊》：佛教界对善款的管理有哪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？

济群法师：善款首先要来源正当，其次要尊重施主意愿。如果施主说明款项用途，不可随意



更改。至于具体管理，佛教中最权威的规定就是戒律。此外，佛教特别强调因果法则，这也是培养自觉性有效途径。丛林中，老和尚经常会教导大众珍惜施主供养，所谓“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”。真正体认到这一点，就能从根本上杜绝管理隐患。当然，仅仅依靠自觉还不够，还需要相应制度进行制约和分配管理，使每一份善款得到最有效的利用。

【佛法是心灵的智慧】

“我平时读书累了，就会去山上走走，或者到海边漫步，或独自沉思，或带上几个学生，或偕同一些朋友，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，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一些人生问题。”他在厦门南普陀寺清修的禅房，位于后山半山腰的阿兰若处，远离喧嚣，每天爬山很方便。

济群法师在我身前时走时停，为我指点，我注意到他走路的方式与我大相径庭。他提步很轻，几乎没有声音，上身也不会因出脚而起伏或改变左右



重心，仿佛在学习，只有大褂的后裾随之均匀地飘忽拂动，状极优雅。

济群法师称自己是“山野之人”，甚至，是“自由主义者”。“不喜欢管人管事，更害怕介入复杂的行政事务中。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管，我讨厌无谓的应酬，没有办法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，也不会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勉强干些不愿意干的事，更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。”因此，在教学之外，他谢绝一切社会头衔和行政职务。

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期间，济群等法师萌生了向大学学子传授佛教文化的念头，他们与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“佛教文化研讨班”，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学生，内容有讲座、参访、禅修、座谈，半个月下来，效果很不错。接着又办了第二、



第三期，后来干脆在厦大成立“青年禅学社”，长期为学生开设佛学系列讲座。后来，他将这一做法带到苏州西园寺，由弘法部专门开办了“青年学佛组”、“青年佛学进修班”，利用周末时间为青年人开办讲座，举行共修。

《人物周刊》：人们对宗教有很多理解上的偏差，而佛教本身也博大精深、教派众多，您修学近三十年，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，什么是佛教？

济群法师：佛法是了解生命真相的智慧，是究竟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。

《人物周刊》：佛教中，受与施的界限如何设定？即佛教界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？又应该为社



会贡献什么？

济群法师：佛教有接受供养的传统。佛陀时代，僧众不事生产，托钵乞食。其意义有二，一是令僧众全身心地追求解脱，利益众生；一是令众生通过供养而培植福田。至于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，这涉及发心等问题。佛弟子中，有“声闻行者”和“菩萨行者”之分，前者追求个人解脱，后者发愿带领大众共同解脱。相应的，行为规范和受持戒律也有所不同。依声闻戒，除生活必需的衣、食、住、医药外，不允许拥有过多个人用品。关于此，律中有非常详细的规定。依菩萨戒，则应广泛利益众生，这就必须多事多业，凡对众生有利的事都尽力而为，这就需要相应的财力和物力。如果发愿利益大众，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弘法事



业，并且不违背戒律的基本规范，那么，得到什么都是可以的。最关键的一点，是不能为了个人享乐。

佛教能为社会贡献的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。

首先，佛教能为社会提供健康的宗教信仰。如果传统宗教得到保护，并有良好的传播环境，以此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，并为他们阐明辨别真伪的标准，各种邪教就不再有可乘之机。其次，佛教能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。在今天，很多人活得非常迷惘，自杀率居高不下，抑郁症与日俱增，究其根源，都是因为对人生的真正价值缺乏省思，这就很容易迷失方向。第三，佛教界能为社会发挥慈善的功能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贫富悬殊现象日益严重，这也导致种种不安定因素的产生。



在福利制度尚未健全之前，依赖社会力量开展慈善活动，是调节贫富关系的必要途径。宗教团体具有较高可信度，应当发挥自身优势。第四，寺院能作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家园。在这个浮躁喧嚣的世间，人们越来越需要一个让心灵休息、让精神升华的驿站，在这方面，寺院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发挥。
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2006年第24期

我的出家生活

最近《法音》编辑部要出一期“福建佛教专号”，约我写一篇介绍福建丛林生活的文章。作为生于福建，出家于福建，并长期在福建从事佛学院教学工作的我，实在没理由开口拒绝。只得以自己在福建几座寺院的生活经历为线索，按居住时间的先后，谈谈福建的丛林生活风范。

【一、农禅并重的支提寺】

提起支提寺，许多人可能会很陌生。在过去是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僻，交通又不方便，所以不为人知。据说现在公路已经通车，但因为不是重要的风景名胜，也很难引来远方游客，所以支提寺还能保有它的清净和纯朴。

“支提寺”是人们对它的俗称，完整而规范的称呼，应该是“支提山华藏寺”。支提山在福建东部的宁德境内，被誉为“东南第一山”，是天冠菩萨道场。据《华严经》记载：“东南方有山名支提，



从昔以来，诸菩萨众于中止住，现有菩萨名曰天冠，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千人俱，常在其中而演说法。”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，经典中有依据的除五台山外，便是支提山了。寺中现有明成祖仁孝皇后所赐的千尊天冠菩萨像，每尊高一尺，重二十余斤，供奉在大殿中。

我和支提山的因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我从小生长在佛教家庭，在父母亲带领下，全家信佛，吃长素。印象中家里常有许多僧人来住宿、吃饭，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，家里每天早晚都念经拜佛。14岁那年秋天，母亲和赛岐万寿寺的戒修尼师发心到支提寺帮忙修补藏经，我也记不清是怎么一回事，就跟她们去了。

我在支提寺以一个行者的身份住了三个多



月。当时寺内大约有僧众三四十人，住持是妙果和尚。那时的人真是很单纯，每天的工作就是锄地、种菜、砍柴。有时师父们带着到山里采菇、挖笋，过得很有趣。肚子饿了，就盼着快些收工。这么一来，吃饭也成了每天开心的事。

当时的出家人，了生死的观念很强，个个都很讲修行。大家白天干活，早晚上殿诵经，称为做功课。既然是功课，每天都必须要完成，即使白天干活干得再累，也很少有人会落下。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吃饭的本钱，祖师们订下的重要修行方法。如果不做功课，不但了生死无门，更是信施难消。

除了早晚功课，每个人大都有自己另外的安排。有的人拜经，比如拜《华严经》或《法华经》，



一字一拜，连续拜上几年。有的人诵经，长期诵一部《金刚经》或《地藏经》等。有的人念佛或参禅，夜不倒单。他们不懂得很多道理，平常也不太讲教理，最多交流一下修行心得。寺庙没有安排集体学习，有的只是师资间的单独传授，做些警策性的开示，但大家都很自觉。

很难想象，我那时身体瘦小，却天天跟着大家干活、念经，起早摸黑真不容易。寺院做功课的时间很长，有时三点多就起床，迷迷糊糊地来到大殿，跟着大众诵经，经常诵着诵着，抱着柱子就睡着了。我在支提寺只住了三个多月，离开时是被宁德地区有关部门的同志起单的。他们到支提寺组织僧众学习了一周，然后就把寺院中的一些青年僧人遣散了。他们说：宗教就要消亡了，



你们年纪轻轻的出什么家，快回去吧！就这样，我们被赶走了。

支提寺我已有十多年没去了，据说现在变化很大，公路已经开通，不必像从前那样走几十里的山路。寺中的大量农田已包给附近的居民耕种，僧众不必像农民一样每天忙于种田，只要种些菜，砍砍柴，可以腾出大量时间学习和修行。听说山上现在还办了一个律学班，成就十多位比丘在那里发心学习戒律，而整个丛林生活也从原始的朴素走向规范。

【二、禅宗祖庭雪峰寺】

稍微了解一点禅宗历史的人，都知道雪峰义存这个名字。雪峰是地名，雪峰寺全称是“雪峰崇圣禅寺”，这里是义存祖师当年修行弘法的道场。今天去朝拜雪峰寺，还能见到义存祖师留下的遗物。如枯木庵，是义存祖师当年坐禅的地方。这是一棵很大的树，树心是空的，祖师当年坐在那里修定放光，才感动当地长者舍地盖寺。天王殿门前，耸立着四棵高大的树木，其中两棵是义存祖师亲手种植的。还有义存祖师的塔，塔上石



头呈绽放状，像一朵朵花，据说这预示着祖师要再来人间弘法度生。

雪峰，正像这个名字一样，是一个清凉的世界。雪峰寺地处福建闽侯县，海拔很高，即使在炎热的夏天，晚上睡觉也可以盖棉被，白天则异常凉爽，真是禅修、避暑的好地方。雪峰寺是禅宗祖庭，自然以禅修出名。寺中有老禅堂一座，木质结构，冬暖夏凉。在这座禅堂里，出了很多祖师。据说当年义存祖师在世时，住众达几千人，曾经有一次坐香，一槌槌敲下去，开悟了几十人。

雪峰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，地处边远的闽侯山区，所以“文革”中僧众也没有间断过。我七十年代末来到雪峰寺，正式开始了出家生涯。当时自以为出家了，现在看起来，其实还是行者



的身份。“文革”中的雪峰寺，一直以生产队的形式存在，寺院拥有几十亩田地和菜园。僧众也像普通的农民一样，每天在田头师的带领下，到田里干活。

那时寺中有一大班老和尚，他们都在雪峰寺住了几十年。有的老和尚从小在雪峰寺出家，到老都几乎没有离开过。他们经历了解放前艰苦的物质生活，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，尤其是“文革”，都不曾使他们动摇对佛法的信心和道念。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人，又是丛林生活的继承者和实践者。和他们住在一起，比起读《百丈清规》，体会更要深刻得多。

有的老和尚熟悉丛林的各种规矩。他们年青时为了寻找善知识，四处参学，住过金山寺、高



旻寺。和他们接触，他们会和你大谈金山香、高旻腿，你会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找不到的丛林轶事。有的老和尚精通敲打唱念，翻开《禅林赞本》，能从第一条唱到最后一条。我住雪峰寺时，跟他们学唱了很多赞。我现在的唱诵基础，就是那时打下的。

有的老和尚禅修功夫很高。在雪峰寺周围有很多茅蓬，那里住的都是修行人。他们觉得丛林的集体生活不利于专修，于是就在寺外找一座或临时盖一座简陋的茅蓬，常住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，让他们在那里专修。有的人日中一食，夜不倒单。枯木庵住有一位叫瑞兴的老和尚，专门诵《法华经》、拜《法华经》，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，冬天也不穿鞋，吃的很简单。我也不清楚他老人家在



这里修行多少年了。印象中，我刚到雪峰寺出家时，他就这么做了。今年暑假期间我到雪峰寺拜访他老人家时，发现他体力虽然不如从前，但修行态度却依然没有改变。

我在雪峰寺就是跟随僧众干农活。记得在雪峰寺后山砍柴，因为山很陡，我当时的个头又小，砍了柴没法挑，只得从山上滚下来，挺好玩的。雪峰寺门前的放生池，“文革”时期被填起来当水稻田，淤泥很厚，在田里干活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有被淹没的感觉。雪峰寺保有中国传统丛林的遗风，农禅并重，僧众除了干农活，早晚二时课诵从不间断。

寺院成就一些禅修者专心坐禅修行，禅堂每天都有人在打坐。其他僧人没事时，也喜欢到禅堂



坐一坐。寺院到了冬天，安排禅七，组织大众共修。打禅七的时候，供斋的人特别多，好吃的东西源源不断，令人大饱口福。如果坐禅时没有得到禅悦的人，此时就能满足一下食欲，也算是种补偿。到了夏天，寺院有时会请法师来讲经，记得当时有位江西的海灯法师给大家讲《心经》，一口江西土话，边讲边笑，每次我们都只能听到他老人家的欢声笑语，总觉得他讲得很好，但就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。

大多数僧人都有自己的修行法门，以念佛、参禅或禅净双修者居多。我在雪峰寺时，亲近过一位老参师父，是参禅的，推崇《六祖坛经》、《传心法要》、《临济义玄禅师语录》。他老人家叫我看这几本书，时常给我开示一些修禅之道。他自己的



修行则不拘形式，重视行住坐卧中对念头的观照，
现在看来他修的是祖师禅。我对禅的爱好，就是
从那时培养起来的。

【三、八闽首刹涌泉寺】

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。开山祖师是雪峰寺来的神晏禅师，千百年来高僧辈出，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住持过鼓山，并对寺院的道风作了整顿。

鼓山涌泉寺历史悠久，文化内涵丰厚，有喝水岩等十八景。历代文人士大夫参观游玩时留下不少墨迹，都刻在石头上。在喝水岩一带，有三百多块摩崖题刻，著名的有朱熹、蔡襄、赵汝愚、郭沫若等人的题字。寺内收藏有多种版本大藏经及经



论，还有刻印经书的经版上万块，尤其是保存了清代为霖道霏禅师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》的版本。民国年间，弘一大师特别发心印了几十部，分赠国内外的各个藏经楼、图书馆保存。

鼓山涌泉寺在“文革”中被园林部门占据，1979年在住持普雨老和尚的努力下，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，归还僧众管理，我就是那时来鼓山的。普雨法师是北京人，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院。出家后在青岛湛山寺亲近过倓虚法师。解放前南下，到圆明讲堂拜见圆瑛法师，由圆老写信给当时住持盛慧老和尚，推荐住涌泉寺。他先后在涌泉寺担任过佛学院的教务长、监院、住持。

老和尚自从住持涌泉寺以来，就坚守在鼓山，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过。“文革”中，寺



院被福州市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，僧人有的被遣送回家，有的被迫还俗，有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，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，不准他们穿僧装，尼众必须重新蓄发。我刚出家时，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，包括像妙湛老和尚、北京的正果老法师、巨赞老法师等人。

普雨老和尚“文革”中被打为黑教头，守在寺院中，做邮差、挑粪、种地，每月政府发给他20元生活费。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，老和尚就着手涌泉寺的恢复工作。通过多年努力，到1979年，涌泉寺才正式归佛教界管理。由于老和尚的道德学问及爱国爱教的精神，先后被推选为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、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、全国政协委员。



老和尚对福建佛教贡献是很大的。他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，使许多被园林、文物等部门侵占的寺院归还僧众管理，维护了佛教界的权益；参与成立省、市佛教协会，推动福建佛教事业的发展；开坛传戒，绍隆僧种；创办福建佛学院，培养佛教人才；接待海外侨僧、国际友人，出国访问，增进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友谊，加强国际友好往来；创办涌泉寺书画社，团结福建书画界人士，使他们增进对佛教的了解。老和尚的种种努力，为福建佛教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我是在涌泉寺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的。在涌泉寺期间，我在客堂当照客。这个差事，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，负责扫地、打开水、倒茶、洗茶杯，还管客房的钥匙，负责给客人开门。涌



泉寺旁驻扎着军队，经常放映免费的电影。有个晚上我随着大人们去看电影，把客堂钥匙带在身边。那天电影一直放到十点多才结束，当我回到寺庙时，知客师告诉我，晚上8点多来了一帮客人，找不到钥匙，无法安单。我知道这下大事不好，第二天老和尚知道了这件事，果然让我写了五张检讨书才过关。

涌泉寺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，每天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。僧众平常的主要工作是看护各个殿堂，给游客们提供方便。寺中设有小卖部、饮食部、佛经流通处，这些工作都由僧众自己担任。有时汽车到福州运货回来，客堂会敲钟，大家听到钟声都要去出坡。全寺上下倾巢出动，如蚂蚁搬家式的，或背或挑或扛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



一汽车满满的货物就搬光了。

寺院到了大年三十会安排一次普茶，这是一种既庄严又轻松的宗教生活。普茶一般都在晚上7点开始，大众听到钟声，穿衣搭袍，三三两两地来到斋堂，恭候方丈的大驾。斋堂的监斋菩萨前，点着两根大红蜡烛，斋堂的条桌上，摆满了水果、花生、瓜子、糖果等，每人面前还放着一个茶杯。方丈在侍者的陪同下来到斋堂后，维那起腔，唱炉香赞，方丈拈香、礼佛、升座，开始给大家开示。这时巡堂拿着茶壶，依次给大众倒茶。在柔和的烛光下，在袅袅的香烟里，在方丈和蔼的话音中，大家静静地品着茶。

禅宗重视生活中的修行，有人问赵州禅师：“如何修禅？”禅师说：“喝茶去！”普茶，是禅与茶



的结合，用平常心静静地品味茶的清香，清清明明，不取不舍，无爱无嗔。禅宗的普茶流传到日本，形成了日本的茶道。记得八十年代普雨老和尚在世时，日本某宗派的住持，还专门在大年三十率领一班僧众到涌泉寺观摩普茶。

寺院也非常重视僧众的学习。普雨老和尚本人对佛学、艺术都有很高的修养，他早就意识到提高僧众佛学水平的重要性，在八十年代初就创办了佛学培训班，招收本省年轻僧伽到鼓山学习，既为寺院充实了新生力量，又能达到提高僧人佛学水平的目的。我在中国佛学院上学时，有年暑假回鼓山，培训班还请我去为班上的同学讲座。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登台演讲，因为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所以没怎么紧张就完成了任务。



鼓山涌泉寺继普雨老和尚之后担任住持的是妙湛老法师，妙老圆寂后，是普法法师。暑假期间我又去鼓山故地重游了一番，得到普法法师的热情招待。普法法师很能干，把整个寺院的殿堂修缮一新，与园林管理部门、政府部门的关系也处理得较妥当，为寺院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。普法法师和我谈了发展佛教事业的一些设想，我衷心祝愿他的规划早日实现。

【四、清净庄严的广化寺】

说起广化寺，在佛教界大概是无人不知的。这么一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地方，怎么会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国闻名的道场呢？这要归功于圆拙老法师。圆老早年亲近过弘一律师，持律严谨，生活朴素，并发心建设一个如法的修行道场，成就僧众修行学习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，广化寺在印尼的常住子孙发心修复祖庭，建设广化寺。德高望重的圆老正好是这个寺庙的子孙，任



务很自然地落到他身上。经过三五年的努力，一座庄严而朴素的道场终于修建完成。寺院修建完成了，很多人可能会争取对外开放，并发展旅游，吸引游客，圆老的想法却恰恰相反。他希望道场能够如法而清净，成就僧众学习修行，避免外人打扰。

很多道场，尤其是风景名胜的地方，一般都要卖门票，广化寺却不卖门票。许多寺院都有旅游服务设施，为游客提供方便，增加寺院的经济收入，广化寺却没有任何旅游服务设施。加上广化寺地处莆田这么偏僻的地方，自然很少有人会特意去参观，从而保持了寺院的清净。在生活条件上，寺院则尽量让僧众过着简朴的生活。

比如在饮食方面，吃饱当然是没问题，不过



菜就比较简单了，通常以咸菜、剩菜居多。苦瓜成熟的季节，可能一个月都吃苦瓜。我当时胃不太好，经常吃完饭，在走向小南山的路上就边走边吐，到房间时往往所剩无几了。穿的衣服是墨染衣，我们的圆老就是穿这种衣服的模范人物。诸位可能搞不清楚何为墨染衣？墨染衣，是将白布用墨汁染后做成的衣服，本人也参与制作过一件。穿着这种衣服，哪怕在煤球上滚三天也看不出衣服脏了。常住每月发给僧人很少的单资，印象中是5元还是10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特别有道心的僧人才能住得下，要享受、讲经济的人绝不会跑到那里去的。

“文革”之后，佛经几乎不太见得到。老法师率先在广化寺开办了佛经流通处，大量印刷经论



及佛学基础读物并发往全国各地，很多人才因此有机会接触佛教书籍。他又在广化寺开设佛学院的预科班，培育佛学人才。常住僧众平常到田地里干活，对想修行的人，寺院设有念佛堂，成就僧众修行。寺院终日佛号不断，修行氛围浓厚。

圆老自己觉得最得意的一件事，是成就五位青年法师学律。这五个人是界诠法师、毅然法师、演莲法师、性光法师和我。从1982年开始，一直到1987年，前后大概经历了五、六年的时间。我们几个人先是住在藏经楼上，起初连南山三大部的书都没有，就从别处借来抄写。一部书抄下来大约要花上一年的时间，然后才开始研究。大体上是靠自学，每天读五页，细嚼慢咽，花了数年时间，才把三大部读下来。我1985年才到广化寺，



那时候三大部已经有好几套，根本不用抄了。我在学习戒律的时候，相对学得比较粗，更惭愧的是，没有认真实践，只能说是懂得一些戒律的皮毛知识而已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将来我们几个人中，界诠法师对律学的贡献和成就应该是最大的。

圆老对我们很慈悲、很关照，觉得我们住在藏经楼不方便，特地在寺院右边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地藏殿，又称小南山。地藏殿不是单独的殿堂，附带着 12 个房间，以及相应的卫生设备，四周还有围墙，避免外人闯入，干扰法师们的清修。小南山的环境非常好，种了很多树木花草。当时，住在小南山的有界诠法师、性光法师和我。这么大的地方，只住了三个人，有一种非常宽松的感觉。

1985 年我自学了一年戒律兼看《俱舍》，1986



年福建佛学院教师、管理人才告缺，我们几个人就被请出来了。界诠法师、性光法师和我帮忙讲课，毅然法师负责管学生。我们经常吃完饭就从溪声阁、观音殿，沿着广化寺后面的山路，散步到小南山。观音殿的旁边有一棵大橄榄树，橄榄成熟的季节，树上果实累累。我们有时就带着学生到后边捡石头扔橄榄吃，有时带着学生到后山玩，让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中，学会放松。

八十年代末期，朴老到广化寺，以“一入山门长道心”的诗句赞叹广化寺。的确，任何人只要进入广化寺，就会感受到庄严、清净的氛围。尤其是参加了二时课诵、过堂吃饭，感受更为深刻。这要归功于一位出色的僧值师——定妙法师，每次过堂吃饭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几乎都要表堂，指



出当天发生的不如法现象，像部队训练军人一样，对僧人威仪进行严格的规范，以达到如理如法的标准。上殿也一样，念佛堂、佛学院的学生都是排队出来，整整齐齐地鱼贯而入，任何人有不合威仪的地方，僧值师都会帮你纠正。

我在广化寺住了4年，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4年，学习戒律、研究《俱舍》，同时也在福建佛学院担任唯识教学。当时毅然法师当方丈，界诠法师当教务长。我在广化寺的生活，只管上课，不必干其它杂务。当时的我有一种原始的单纯，思想很简单，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、上课、吃饭、散步、禅坐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直到中国佛学院邀请我去讲课，这才离开了广化寺。

广化寺原来是子孙道场，在圆拙老法师手上



改为十方丛林，礼请毅然法师为住持，奠定了广化寺道风的基础。继毅然法师之后为学诚法师。学诚法师 24 岁就开始担任广化寺的方丈，到目前已经连续干了好几任，广化寺依然清净庄严。一种风气的开创、形成固然不易，而能长期保持也是一件艰难的事，学诚法师可谓年轻有为。

【五、轰轰烈烈的南普陀】

普陀，是一个和观音菩萨有关系的名称。四大名山中有普陀山，又称北普陀，是观音菩萨的道场。南普陀寺的地理环境与北普陀很像，都在海岛上，可能是因为在北普陀以南，所以叫南普陀寺。

南普陀寺的崛起，是因为闽南佛学院的创办。南普陀寺原是子孙道场，在转逢和尚任住持期间改为十方丛林。会泉和尚住持时期创办了闽南佛学院，礼请近代著名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主持，一



时海内外佛教精英都云集于此。弘一律师晚年长住闽南，有许多时间都住在南普陀寺。我现在住的阿兰若处，便是当年弘公静修的场所。弘一律师在闽院担任过课程，还为闽院增设了养正院，亲自设置课程，并为学员上课。

厦门是个开放、自由、舒适的城市，是过日子的好地方。南普陀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自然会受其影响。已故的妙湛老法师有很开放的胸怀，不但恢复了闽南佛学院，还支持全国各地办学。他帮助恢复了岭东佛学院、武昌佛学院，协助创办了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、广东陆丰佛学院，并支持中国佛学院、福建佛学院办学。老法师不但重视培育人才，也愿意为中青年法师创造各种条件，发挥他们的所长。像我这样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



人，想在寺院干些事，通常是很难的。而在南普陀，妙老既能包容我的无政府主义，又能给我提供各种方便，让我干自己喜欢的事。妙老对我是这样，对其他有一定专长的法师也是这样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南普陀的佛教事业百花齐放，成了全国佛寺中发挥最大功能的一座寺院。南普陀寺设有禅堂、念佛堂，想修行的僧人来到这里，可到禅堂、念佛堂安单。南普陀寺有能容纳四、五百人的弘法讲堂，长期为厦门的善男信女及中青年知识分子、厦大学生开设不同层次的佛学讲座。有慈善事业基金会，从1992年创办以来，目前已发展了数万名会员，启发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，寻声救苦，给失学儿童、疾病患者、受灾群众和贫困户送去温暖和关怀。



妙老有禅者的风范，性格直爽，生活朴素，待人和蔼，平易近人。早晚学生扫地，周末劳动，老法师无不亲自参与。干活的时候，挖土、扛石头，老法师的劲头更令年青学生敬佩。有时老法师会拿着一根木棍，发现哪个学生偷懒、不守规矩，就给他一个当头棒喝，打得学生鸡飞狗跳。老法师八十多岁的高龄，天天都和大众在一起生活，一起上殿、过堂。早晨打板之后，在钟鼓声中，往往伴随着老法师的叫声：“快起床了！”这叫声比板声更管用。有时老法师会亲自到学生宿舍，突击检查，或挨门叫唤。

方丈住持丛林，有教化大众的职责。妙老以斋堂为课堂，天天吃饭时都要表堂。表堂的内容很少引经据典，或纯理论的说教，而是就每天的



生活，以身边发生过的事例，教导大众在行住坐卧的四威仪中健康地生活，如法地修行。老法师有一句名言：“打不走，骂不跑，就是好宝贝。”所以，有些人犯了错误，尽管害怕老法师的棒喝，却不必担心会被赶走。

老法师早年在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门下学过天台，又在扬州高旻寺亲近过来果老和尚。解放初来到厦门，一直住南普陀寺，坚守在寺院中。政府落实宗教政策，妙老马上就担负起南普陀寺的恢复工作，接受十方僧众挂单，同时也着手佛教人才的培养。先复办养正院，1984年正式恢复闽南佛学院，有男、女二部，男众部设在南普陀寺，女众部设在万石莲寺，学院分设养正院、预科班的两个层次，各招三五十名学员，学员来自全国



各地。随后预科班升为4年的本科班，养正院改为预科班，学院从原来的4个班级发展到6个班级，人数也从原来的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。1999年在圣辉院长住持下又增设研究生班，聘请国内高等院校的著名学者、法师担任导师，正式招收了7名研究生。

我是1988年冬天到厦门的。当时刚离开广化寺准备北上，路过厦门到南普陀寺挂单。在寺中碰到在中国佛学院教过我的方兴老师，他希望我能够留下。对厦门并没有太多印象的我，也不知是什么因缘就答应留下了。当然，我那时只想暂时住一住，根本没有做长期的打算，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多年了。

在厦门，我的主要工作是教学。刚来时讲过



戒律，后来一直都讲唯识，几乎把唯识宗的一些重要经论都讲了一遍，为我唯识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在厦门很容易接触到海外的法师、学者，从听他们的演讲到和他们的交谈，对我日后走向弘法道路有启蒙的作用。

记得 1989 年的年底，台湾的游居士到南普陀寺，学院请他在普照楼为学生及常住大众举办讲座，开讲《大智度论》中关于六度的内容。据说他是佛学博士，当时我还不清楚博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只听他五六年讲下来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当时我和湛如法师住在一起，我们都很好奇。讲座完的那天，正好是除夕之夜，我们设计把他请到山上，请教他博士是怎么搞到的。一直谈到新年钟声敲响，似乎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。现在湛



如法师都读完博士后了，我虽然没去读，但也知道了博士的含义。回头再想一想那时的举动，觉得真是有趣！

1989年春节，台湾圆光佛学院的教务长惠空法师，带着高度的弘法热情来到南普陀寺。当时我们对台湾佛教的情况简直一无所知，有的只是神秘感和好奇心。客堂安排惠空法师住在方丈室，当时我也正好住在方丈楼，这样就有机会经常见面。惠空法师很健谈，不断向我们介绍台湾佛教界发生的一些情况。有时到我住的房间，一直讲到三更半夜。有几次我都是边听边睡，他讲着讲着我就睡着了，醒来又担心不礼貌，赶快支吾两下，法师还以为我在认真听着，结果又继续讲下去。

1991年，我和湛如法师分别在厦门的妙清寺



讲《药师经》和《维摩经》，迈出了我们在厦门弘法的第一步。1992年我和湛如法师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，开设“正信佛教系列”和“人生佛教系列”的讲座。当时，我们两人都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的课程，并与历史系的领导和一些主要老师建立了良好关系。1992年的年底，我们打算和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“佛教文化研讨班”。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历史系领导的支持，于是，研讨班在紧锣密鼓中开始招生了。

通过什么方式把学子们吸引到南普陀寺听佛学讲座呢？我们请了厦大美术系的老师帮忙设计广告。广告的内容，我们很费了一番心思，希望写得精彩些。记得其中两句大标题是：“探讨人生真谛，叩开佛法大门”。广告的版面特别大，又是



放在厦门大学最热闹的地方，所以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学生，研讨班为期两周，安排了八、九次活动，内容有讲座、参访、禅修、座谈，半个月下来，效果很不错。接着，我们又开始办第二期、第三期，后来干脆在厦大成立青年禅学社，长期为厦大的学生开设佛学系列讲座或专题讲座。

能在厦门安心从事教学和弘法，要感谢妙老对我的成就。我是个自由主义者，不喜欢管人管事，更害怕介入复杂的行政事务中，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管。我讨厌无谓的应酬，没有办法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，也不会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勉强干些不愿意干的事，更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。老法师知道我存在这许多严重的问题，于是就同意我住在后山的阿兰若处。平常没有外出弘法时，每周



除担任二至四节课，其他时间都是我自己的。我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，选择自己喜欢干的事，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，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。

湛如法师和我一起同住在阿兰若，平常我们各读各的书。他讲授中国佛教史，每天备课、写讲义，总是干到三更半夜，而我通常在九点后就不太看书了。这注定了他要成为博士后，而我依然还是一个山野之人。我平时读书累了，就会去山上走走，或者到海边漫步，或独自沉思，或带上几个学生，或偕同一些朋友，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，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一些人生的问题。

南普陀寺自妙老圆寂后，继承妙老事业的是圣辉法师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南普陀寺的佛教事业又上一个新的台阶。圣辉法师从 1997 年升座以来，



对常住、佛学院、慈善基金会进行了全面整顿，消除不良现象，制订各种制度，使寺院的管理走向规范化。而妙老开创的佛教事业，在圣辉法师的手上也得到了发扬光大。

发表于《法音》2000年第1期